

家中老人生病,每天瑞金医院和家里两点一线,像打仗。八点出医院,可以坐地铁,但更愿意坐24路公交车回家,车子里人少,每个人都面目模糊,我也是沉默的其中一员,只有起起落落的报站声音,玻璃窗透进淮海路上的霓虹灯剪成流动的绸,这时候忽然感受到被这座城市绵密的夜色笼罩着,今夕何夕,一恍惚,已经坐过站了。

裹馄饨

李舒

仿佛有些气若游丝了,越是忙,越要在其中找一点属于自己的安静,有时候是织毛衣,棒针碰到细碎声响,毛线团在藤椅边打转,织错一针要拆半尺,倒像是把烦心事也拆散了。有时候是刀背敲大排,斜四十五度落下,力道要像黄梅雨,绵绵密密。我的回魂大法,是给自己做一些琐碎家务——比如裹馄饨。

我喜欢裹馄饨,案板上扑一层薄薄的白色面粉,水汽从灶边升起来,汤锅咕嘟咕嘟,像在低声念叨着谁的琐碎心事。我忘了是和谁学的包馄饨,可能还是我妈,她有段时间,时常包荠菜大馄饨,青瓷调羹在瓷碗里转圈,荠菜拌着肉糜沙沙响,调羹一挑一折,馄饨便生出燕尾似的褶,案板上不一会儿就满了,像月份牌上的美人排排坐。

包馄饨最忌心急,皮子要像苏州绸缎般服帖,可偏是这样一件费神的活计,能把人心里那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像线团似的,一圈圈理顺了,摊平了,露出点微妙的光。

包馄饨算不上风雅,但我从不觉觉得累,因为可以一边包一边听评弹,是无上享受。重温《花样年华》,最近反复在听《收台报喜》,朱雪琴唱“七十二个他”,啾啾呀,想起做小姑娘的时候,有一次陪长辈听评弹,到了那里,才晓得居然是相亲录。那天唱的是《玉蜻蜓》,那位女先生偏着脖颈,月白旗袍领口缀的琉璃纽扣,嗓子倒是蛮好的,滴溜溜的甜,唱了几句,我已经不生气了,因为值回票价。倒

是和我一起上当的年轻人面上气鼓鼓的,他居然和《玉蜻蜓》里的申贵升同姓,台上的申家少爷春色荡漾,台下的申家少爷很是不耐烦,一直抱怨说要喝咖啡,听十分钟已经开始打呼噜,我猜他估计不晓得这出其不意的是庵堂遇尼姑的桃色事件,其实蛮扎劲。

张爱玲说评弹像是“有如咬住了一个人的肉似的,啾啾呀呀地老是不松口”,她大概还是听得少,不过听评弹包馄饨真的开心,手里不停,但是心就这样放松下来了,能让人忘了大而无边的问题。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存在性缓冲”,说的是人怕虚无,怕日子没个抓手。可你低头捏着面皮,忙着这一锅汤里的小团圆,那些飘忽的,抓不住的忧虑就退到远处,像雾散了,露出一片清明的天。心流这东西,便在这琐碎生出来——不是什么高深的玩意儿,而是指尖上的凉、舌尖上的烫,硬生生把人拉回这烟火人间。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裹到一半,已经迫不及待给自己弄一碗下午点心吃。下锅时,水面翻起白浪,那些馄饨浮上来,挤挤挨挨,像一堆不肯散场的旧人。热气扑到脸上,烫得眼眶有点潮,你忽然觉得,这世上有些事是自己能抓得住的,哪怕只是几只馄饨,也够堵住心里的那个窟窿。汤底照理是“神仙汤”——一勺猪油、一勺酱油、一点虾籽,一勺开水下去,已经香味扑鼻。迫不及待吃下去一只,汤汁烫得舌尖一麻,那一刻,心像被谁用温热的手指点了点额头,低声说:“会好起来的。”

乱世儿女,要什么快意恩仇,意义不在远方,在亲手创造的每个瞬间。黄昏时分,各家窗台飘出油煎带鱼的香气,修棕棚的江西人敲着竹梆子走过,这些琐碎声响织成网,兜住快被地铁站吞没的都市游魂。细细想想,三餐茶饭,四季衣裳,所求平安,如是而已。

怀念谢稚柳先生

徐一轩

谢稚柳先生去世至今有28年了(1997年逝世)。其间一直想写点文字来纪念我们的往事,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心里不能忘怀。

我拜师陆俨少先生不久,经任书博老师引荐,来到位于乌鲁木齐路近肇嘉浜路的一栋大楼去拜访谢稚柳先生,老先生很热情地把我们请进房间,聊天中得知我是陆俨少先生的学生,距离一下拉近了。后又得知我住在襄阳路,与他住所仅一条马路之隔,再三叮嘱有空可到他这里坐坐。从此我没事就往谢先生家中跑。谢先生是一位和蔼可亲,没有一点架子的大家画师,大鉴定家,是一位文质彬彬、常年戴着一副墨镜、笑容可掬的长辈。他见我总是很热情地与我聊天,聊往事,聊他与张大千、徐悲鸿等画家的交往。陈佩秋老师对他的评价:“他是老好人!”

他的画室一年四季人流不断,他不会把来访者拒之门外,他对朋友求字画,一般都是来者不拒的,所以我们在晚年常常戏称他是“白弄山人”。

上世纪80年代,我与书画出版社孙杨兄一起去长江三峡写生,回来画了不下三四只手卷,每画好一件都请谢先生题引首,题跋。有次,谢老突然对我说:“你几时搞画展,我来给你写招牌。”后来把“徐一轩画展”直幅写好送我。陆俨少老师给我写了一本《古诗杂书》的册页,我装裱好后请谢老题签条,谢老看了以后说我也给你写一本,后来写了《自作诗绘事十首》加跋共12开册页送我,我裱成了一个手卷收藏着。谢老对陆老师的艺术非常欣赏,评价极高,一点都没有文人相轻的架子,多次对我说:“你老师天分高啊!天分高!文章诗词也好!”

谢先生说,搞书画创作跟搞文学一样,也要重视收集素材,这大概也是石涛所谓的“搜尽奇峰打草稿”的意思吧!我有段

时间喜爱山水写生,从无锡惠山回来,我把写生的画请他看,他看了说:“你这都是照相机镜头。”我问他中国画构图有什么规律?他说:“四条边一个中心,语简但意思你自己去体会。”他曾对我说:“中国画色彩这一方面还可以探索一下,不一定要纯水墨的。”有次到他家,他问我:“最近博物馆去过吧,你喜欢哪些画家?”我说:“我喜欢石涛、八大,很多人都说董其昌好,不知好在哪里?”他对我说:“你是用西洋画的眼光在看中国画。”总之,这样的谈话是经常性的,谆谆教诲,初不甚解,言简意深要你慢慢体会。名义上他谦虚地称我为“友人”,实际上也是一种师生关系无异。

谢稚柳先生鉴定眼光世所共识,有一夜我正在他画室,见有人送来一幅朱耷的立轴请他鉴定,他展开只看了一眼便道:“假的!”那人走后我便问他,你鉴定得这样快,有何窍门?他说:“鉴定主要看作品本身,要对作者的笔性、时代气息,各时期的风格演变非常熟悉,至于纸、章、印泥等只能作为旁证,要看得多。”

上世纪80年代,是书画家最为忙碌的年代,谢先生应邀参加国务院倡办的“书画鉴定小组”并任组长,整年游走在全国各地进行书画藏品的鉴定工作。谢老八十多岁时,上博组织一批专家去新疆考察石窟绘画,风尘仆仆跋涉数千里。回来后我去看他,谢老很得意地和我讲:“你看,我的身体还不错吧。”不过后来有一次遇见徐建融兄,他突然告诉我,谢稚柳在美国有次吃饭胃痛发作,去医院检查出来患了胃癌,目前正在美国治疗,并开了刀切除,年底回国。我见到他时,人已瘦弱不堪了。他见到我,显得很高兴,并让人取来一本上海人民再版的《鉴余杂稿》送我。我和谢老最后一次见面,我记得是下午到瑞金医院病房探望他,陈佩秋

读诺贝尔文学奖得主(2021)英籍非洲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的长篇小说《海边》,起初被复杂的情节线绕晕,直到看到在故乡桑给巴尔横遭陷害的男主角奥马尔被迫冒险偷渡英国。临行前,他发现自己有一个不大不小的麻烦——身为受到赦免的囚犯,他没有资格办理护照。

故事进行到这里,之前埋下的所有伏笔都归拢到了一起。当年在房子的交接过程中,奥马尔曾经接触到不少拉蒂夫家的旧物,最后他只留下两样东西。一样是曾让年幼的拉蒂夫倍感屈辱的乌木桌子,另一样就是拉蒂夫的父亲赖普·舍尔邦(这就是陷害了奥马尔的仇家)的出生证——而后者,恰巧能在这个骨节眼上充当奥马尔的救命稻草,让他得以顺利办理护照,踏上流亡之路。

说实话,我读到这里非常佩服作者的这种四两拨千斤的写法,一个小小的道具就盘活了整个小说结构。在去年古尔纳访华的行程中,我专门提出了这个问题,古尔纳先生自己也很得意。他说:“这张出生证不仅合理推动了小说的情节,而且构成了一个优美的反讽。生活中充满了巧合,主人公正巧获得了这份出生证明,然后办理了护照,而这又恰巧让他因此‘继承’了死去的仇人的身份。”我们不妨再想深一层,奥马尔此后一直沿用这个身份,顶着宿敌的名字颠沛流离,既是出于现实的需求,又带着某种难以言说的、隐秘而矛盾的情感。同时,也正是这个关键的冒名行为,促成了拉蒂夫与奥马尔的重逢。

《海边》的引人入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这个巧妙的、跌宕起伏的故事本身。以至于,我们其实根本不需要在小说的技术层面做过多的阐释,就能被这个故事深深打动。奥马尔与拉蒂夫通过不断的倒叙、插叙,互相补充,从互相敌视到各自的记忆渐渐动摇,当年在故乡遥远的海边积攒下的仇恨终于在异国慢慢化解。这个化解的过程并不是靠具体的行动来达成的,而是通过两个人物不断地叙述,通过把过往残缺破碎的经历点点滴滴补充完整。这也正是古尔纳写作的典型风格,他只需要用平实克制的口吻娓娓道来,任凭政治、历史与家庭纠葛在错综交缠的人物关系中冷静而缓慢地流过。当奥马尔与拉蒂夫身处故乡的时空中时,他们无力看清历史的全貌,只能感受到互相施加的压力与伤害;唯有时过境迁,跳出局外,才有可能在陌生的环境中、在彼此都具有“同病相怜”的移民身份时,达成和解。

读小说时我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海边》写两个家族之间琐碎而悠长的隐痛被慢慢揭开,这样的情节、这样的写法,我在那些典型的西方小说里其实见得并不多。作为一个中国读者,我对小说中牵涉的复杂的家庭结构、拥挤的环境、传统的家族观念和生态,特别是其中那段因为两套房产所产生的纠纷,都会产生某种莫名的熟悉感,甚至亲切感。

老师陪伴着他,手里拿着一杯刚榨好的西瓜汁,喂他。其实他已经很难下咽了!见我外面很高兴,我谈了一些外面的见闻。3点左右,护士进来对他说:“谢先生,我要给你打针了。”我忙作告别,他待我走到门旁的时候,突然向我挥一下手道:“不送了。”回去以后过了两天,我突然收到他儿子谢定玮的电话,告知我谢老已于昨天

逝世。这便是我见到他最后一面的情景。谢先生逝世后有一天我去看陈佩秋老师,陈老师从楼上下来,手里拿着两张书画送我,我展开一看,一幅兰花,另一幅书法,上书“天意怜幽草,人间重晚晴”。还是刚从她画册中出版过的,读了这两句诗,个中含义不言而喻,老先生重感情,令我们做小辈的感动不已。

优美的反讽

黄昱宁



竹溪草堂 (中国画) 林伟光

汉字有“炼字”之说,如“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意思可以完全不同,前者丧气,后者却不屈不挠。还有如“僧敲月下门”,推改为敲,也是脍炙人口的。这些都是著名的例子。

炼字

何亮亮

不同的断句,也有不同的意境。如杜牧著名的《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有人断句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似别有韵味。曾在香港一位商界大佬的客厅



看到一横幅“茶可寿也通禅”,可断句为“茶可寿也,通禅”;“茶,可寿也,通禅”;也可断为“茶,可寿,也通禅”。王安石那句著名的“春风又绿江南岸”,一个“绿”字,春天气势扑面而来。想起知青时代与此有关的轶事。当年在闽北乡下的知青,有喜欢古诗词的,常常相互交流,还有人喜欢自己填词作诗,记得有一次一个知青以旧体诗描写春耕,有“卷秧又绿江南岸”之句,颇为切合当时的情境。这位知青后

来参加高考,如愿读了古典文学专业,成为某大学的中文系教授。现在流行说“颜值”,已故诗人余光中对此非常不屑,他认为中文有很多形容美貌的词汇,何必用这个从日本汉语借用的词。当然这种现象也就留待语言学家研究了。

记得侯宝林有一个相声作品,讲到各地的方言,他举这样一个两人对话的例子:

“谁?”
“我。”
“啥?”
“尿。”
谁都听得懂。
多年前还需要用电报作紧急联系的通信方式,因为是按字计价,所以“母病速回”之类的“电报体”也是一代人的表达方式。
曾在深圳一家饮品店,听到这样一段对话。一个貌似店长的年轻人,在电脑前工作。两个小青年,似刚从外地来此,年龄大概十七八岁。小青年进门就问“招不招工?”店长也不回:“招。”“管不管吃住?”“不管。”两个小青年掉头就走。我正好经过,见状不禁莞尔。



这世间,对我来说,如果还有什么称得上难事的,减肥绝对可以算一件。
孟子说,食色性也。人打娘胎里出来,生的眼耳鼻嘴脑,天生就是为了一个“吃”字,君不见,眼睛是用来看的,鼻子是用来闻的,耳朵是用来听的,嘴巴呢,当然是用来接触体验食物的,当上述四项功能验证了食品的美好程度,自动综合打分后,脑子就产生了意念,从而就有了美食与陋食的区别。而对任何人来说,吃香喝辣是人的天性,是祖祖辈辈的基因传承,是灵魂深处的呐喊。可偏偏天不遂人意,凡是绝大多数人喜欢的美食,基本都是这个超标,那个超标……海鲜是大海的馈赠,可象鼻蚌、大龙虾、帝王蟹的枕边,躺着超级尿酸这位美人。奶油蛋糕香甜如蜜奶香浓郁,可它的肚子里怀着脂肪这个巨婴,更为

“促狭”的是,无论是植物奶油还是动物奶油,一律标着“人类不宜”。那就来点肉吧,无论是猪肉、羊肉,抑或牛肉,这些经过烹饪加工或浓妆艳抹或轻轻淡妆的的家伙,香得流油中无不带着浓重膻水,而重油重糖无不例外胆固醇统统超标。那就来点干货吧,天下第一鲜香的火腿,水里多浸浸,超标的盐总淡下来了,可隐藏的亚硝酸钠却无法抹掉。
基本可以断定,天下美味,无不与健康作对,而减肥的根本目的,是还物质极大丰富后的人们一个健康躯体。因此,对于减肥的人来说,每天睁开眼睛,迎接自己的第一个问号,就是吃还是不吃?这样的选择

减肥难,减肥真难

姜志芳

实在是太难了,蜀道难,蜀道只要爬一次,可吃与不吃天天要碰到啊;关于生死,一百个哈姆雷特有一百个答案,可吃与不吃只能二选一。对于今天的城市年轻人来说,咖啡几乎是续命的必需品,就有人天天要问自己吃与不吃这个问题。我一位得了癌症的朋友,她以往一天三杯奶咖的节奏。开刀后,她每天纠结的,就是喝不喝咖啡?喝多少咖啡?加不加糖?加不加奶?加多少?她说:不喝吧,馋;喝吧,怕胖副作用。最近,听说她放弃了抵抗,每天规定自己只喝一杯加糖加奶的咖啡,喝完就把杯子藏起来,开始等待下一次的开启。包括我自己,见过太多在美

食面前忘记减肥忘记健康的人。记忆中,只有一个姓周的董事长例外,他出身豪门,吃什么都是习惯浅尝一口,连喝杯牛奶,也是留下大半杯。平时聚餐,别人用嘴吃,他是用眼睛吃,偶尔动一筷,也是珍惜羽毛得很。但他抽高档雪茄却是一口接着一口朝着天空毫无节制地喷,如果把烟酒茶也列入美食行列的话,这这也是一个在味道面前忘记健康忘记管理身体的主。
或许真是人类难于管理美味带给健康的困惑,减肥这件事就上升到国家关心的大事,也许过去的减肥不成功,因为重视会变成以后成功的垫脚石,还是走着瞧吧。

十日谈

减肥这件事

体重管理是值得终身追求的生活
责编:殷健灵 潘嘉毅 连续刊